

黄拔荆 著

丰玉河史

上卷

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中

国

黄拔荆 著

词

史

上卷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前 言

(一)

词，原称“曲子词”，本是一种音乐文学。这种配乐而歌唱的抒情诗体，它的兴起与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。词的产生，可以追溯到隋唐时代。魏晋南北朝以后，西域和外国音乐陆续传入，它们与中原汉族传统的民间音乐相结合，便产生了一种新型的音乐——燕乐。到了唐代，燕乐已在民间广泛流传。据《旧唐书·音乐志》记载：“自开元以来，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。”这里所说的“胡夷里巷之曲”，就是指燕乐。最初，它只在民间流行。为了给这种新乐配上歌词，于是民间开始了填词的尝试，敦煌曲子词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唐代民间的创作。中唐之间，一些接近民间的诗人感到这种新声的美听，开始依声定词，按曲拍为句，创作新词，从此便出现了文人词。经过晚唐五代一批专业词人的努力，它才逐渐定型，并由民间正式登上文坛。到了两宋，词进入了全盛时代。词人之众，风格流派之多样，艺术性之高，都是无与伦比



的。词作为宋代文学的代表，永远放射出炫目的光彩。金元之后，曲从北方兴起，词开始降为从属地位，但并没有衰亡，而是以不同的面目、新的姿态进一步发展。从明代初年到中叶，因社会黑暗、政治腐败、法网密布，知识分子思想受到高压，词坛曾一度出现萧条景象。可是到了明末，由于异族入侵，爱国思想高涨，词的创作又出现了新的生机。清代是词的复兴时期，词人辈出，各种风格流派争妍斗艳，蔚为奇观，词人、词作之多，其数量远远超过宋代。因此，可以说，词自隋唐兴起直至近代，始终没有丧失其活力。它虽然历尽高低起伏的变化，走过迂回曲折的道路，但一直是从不同角度、不同侧面反映出一定的时代风貌，按自身内在的发展规律，继续发展和流传。

(二)

词作为我国诗歌的一种式样，它既区别于传统的诗，又不同于金元间新兴的曲。在我国诗坛上，诗、词、曲三者鼎立，各自独标一格。从艺术角度看，在我国一切形式的诗歌中，相对地说，词是最纯粹的艺术品，它具有曲折、含蓄、优美、情景交融、意味深长诸特点，最少公式化与概念化，是我国优秀诗歌遗产中极其珍贵的一部分。

随着词的产生、发展、兴盛、演变，人们很早就注意到了对它的研究。自宋以来，每个朝代都有人重视这一方面的工作。特别到了清代，词学更是出现了空前的繁荣。其间有不少词人、学者对词的选编、汇刻、辑佚、校勘、考订，下了很大工夫，为词的作品和资料的

保存、流传做出了重要贡献。对词人的评价、具体作品的艺术分析、词论的编写、词律的审订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，发表了不少精辟的见解。尤其词论和词律数量之多、质量之高，都远远超过前数代。但总的来看，他们基本上还是走词话、评点的老路，缺乏系统的理论，没有突破传统诗词评论的格局。成就最高的是清代末年况周颐的《蕙风词话》和王国维的《人间词话》。

辛亥革命之后，词学又有新的发展，相继出现了一些通论性的词学专著，比较全面系统地对词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论述。特别是1935年初创刊的《词学季刊》，对词的研究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。

1949年以来，许多词学研究者重视词的理论建设，运用新的观点、方法从事词学的研究，克服了前人的缺点和偏向，把重点放在对词的起源、发展、演变的梳理，风格流派的探讨，词人的研究评价，作品的选析鉴赏，词集的点校笺注，词话的整理汇编，以及一些带有普遍性问题的讨论上，并且在这些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，基本上改变了词学的旧貌。

（三）

词自隋唐兴起到近代，经历上千年的时间，跨越过不同的朝代和历史时期，产生了温庭筠、韦庄、冯延巳、李煜、柳永、苏轼、秦观、周邦彦、李清照、辛弃疾、姜夔、吴文英、张炎、元好问、张翥、陈子龙、朱彝尊、陈维崧、纳兰性德等这样一大批著名词人。现存的唐、宋、金、元、明、清的词作，估计已突破30万首。其中不少作品都具有健康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，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，很值得我

们来继承，并作为今天发展新文学的借鉴。因此，探讨词的源流、发展、演变、兴衰的规律，总结词的创作经验，阐明词和社会经济基础、上层建筑以及其他文学艺术的关系，评价各个历史时期的大小词人和词作，研究他们风格、流派和艺术成就，弄清他们的创作贡献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对后代的影响等，都是很有必要、很有意义的工作。而词史的编撰，正是为了担负起这项繁重的任务。

但是应当看到，由于历来把词看做“艳科”、“小道”、“末技”，甚至说“厥类颇卑，作者弗贵”^①，公然对词作者采取蔑视的态度，瞧不起他们的人格，贬低他们的社会地位。而有些评论家则干脆断言“宋后无词”，把金、元、明、清以来词的发展历史一笔勾销。这些观点，不但阻碍词学研究的繁荣与发展，而且也影响词史的编写与出版。

(四)

关于词史的编撰与出版工作，解放前曾有王易的《词曲史》、刘毓盘的《词史》和胡云翼的《中国词史大纲》相继出现。但是由于这项工作在当时尚处在草创阶段，人们对词史的内涵还把握不住，对词史的编写体例也无章可循，没有成熟的定见，如何治词史，大家都很陌生，一切都在摸索之中，加上理论准备不够，以及主客观等诸方面的历史原因，所以这些著作都难免存在或多或少的缺陷。如王易的《词曲史》将词与曲合在一起，虽然对词的源流、派别与演

^① 永瑔、纪昀：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·词曲类》。

变也作过一些探讨，但因缺乏理论指导，又认识不到政治经济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密切关系，只能就词论词，这样就难免支离破碎了。对有关词人的评价、作品的分析也极简略，一般只三言两语带过，连他们的创作特点、艺术成就、继承与影响，也论述得不多。至于探讨词的发展规律，自然也就更谈不上了。因此，严格地说，不能称之为史。刘毓盘的《词史》只是把历代主要词人按次序排列一下，然后举其代表作一二，作简单的说明，有的甚至只举其词为例，不作任何分析，像一部词人点将录。有关词的起源和不同的发展阶段，偶尔也有涉及，但都十分简略，而且有不少地方不符合词的历史事实。与其说是“史”，倒不如说是“通论”更为确切些。胡云翼的《中国词史大纲》仅从唐五代、北宋，对词的起源、发展，以及主要词人、词作、词风作阐述，较为单纯，自然是不能概括词史全貌的。总之，在开垦词史这块处女地中，他们虽然洒下了辛勤的汗水，做出了应有的贡献，在当时也产生过积极的影响，但是到了今天，他们的著述已远远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了。

（五）

1949年以来，词学虽然出现了新的面貌，人们对词存在的偏见也有根本的转变，词在文学中的地位有一定提高。但由于受重政治轻艺术，片面理解“古为今用”的“左”的观点影响，总认为“词反映生活面狭窄”，“思想性不高”，所以常因政治气候变化而影响词的研究工作的开展，曾出现过几起几落的波折。因之词史的编撰工作，自然也就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



制约而不能顺利进行。尽管如此，但近年来还是出现了几部有影响的属于史类专著，如杨海明的《唐宋词史》、严迪昌的《清词史》和许宗元的《中国词史》。其中严迪昌的《清词史》对清词总体的把握、流变的区分、风格的辨认，以及具体词人的评价，均有独到见解，堪称成功之作。虽然这些著作都只是断代史或简史，但却为进一步编撰词的通史，提供了有益的借鉴。为了促进词学研究，弘扬祖国文学遗产，本人不自量力，迎难而上，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，撰写成这部著作。由于《全明词》尚未出版，《全清词》仍在编纂之中，加上自身的学识、见闻、才力以及其他条件的限制，缺点、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，希望能得到同行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。

黄拔荆

2002年春节于厦门大学敬贤第一楼



黄拔荆

1932年1月出生。福建闽清人。当代著名词人，词学家，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。1958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。1958年至1960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，从导师林庚、吴组缃、王季思教授专攻唐诗、宋词、元明清戏曲和小说。长期在高校从事中国古典诗词创作、教学、研究。著有《梅浦词》（甲、乙、丙、丁稿）、《词史》（上卷）、《元明清词一百首》、《词林采英》、《南唐二主暨冯延巳词传》等。主编“中国古典文学基础丛书”。

目 录

前 言 壹

第一章 词和词的起源 1

第一节 词和词的名称 3

第二节 词的起源 10

第二章 唐五代词 25

第一节 唐代民间词 28

第二节 唐代早期文人词 46

第三节 温庭筠、韦庄和其他花间派词人 59

第四节 李煜及南唐其他词人 107

第三章 北宋文人词 125

第一节 北宋前期词人 130

第二节 慢词的奠基者柳永 169

第三节 “指出向上一路,开创一代词风”的苏轼 185



- 第四节 秦观、贺铸以及北宋后期其他词人 200
- 第五节 北宋词的殿军周邦彦以及其他大晟词人 251

第四章 南宋文人词 279

- 第一节 杰出女词人李清照以及朱淑真等其他南宋女词人 283
- 第二节 张孝祥和南渡前期其他词人 310
- 第三节 爱国词人辛弃疾 375
- 第四节 陆游和南宋其他爱国词人 395
- 第五节 姜夔、吴文英以及其他格律派词人 432
- 第六节 南宋末期主要词人 467

第五章 两宋民间词 503

- 第一节 两宋民间词人 508
- 第二节 两宋民间词的思想内容 511
- 第三节 两宋民间词的艺术成就 521

第六章 金元词的演变和发展 533

- 第一节 金朝词的发展概况及其初期、中期主要词人 536
- 第二节 元好问及金末其他词人 556
- 第三节 元代前期主要词人 574
- 第四节 元代中后期主要词人 603

第一章

词和词的起源



第一节 词和词的名称

词，又称“曲子词”，是一种音乐化和格律化了的杂言体抒情诗。从音乐化方面看，词虽上承乐府，但与乐府不同，因为乐府所用的音乐是“清乐”，而与词相结合的音乐则是“燕乐”。从格律化方面看，词与近体诗有一定关系，不过近体诗格式只有那么几种，字数、句数、平仄、用韵的方式也都很固定，比较简单，词则要复杂得多。词的长短的句式和疏密的韵脚跟近体诗有明显差别，并且与词的合乐不同的是，近体诗不一定配乐。虽然唐代也有歌诗的情况，但那也是先有诗，然后再按诗配乐。也就是说，诗与乐的结合，只是以乐迎合诗，因此，诗无须迁就乐曲而改变自己原来的格式。词则不同，一般来说，都是先有了乐谱，然后按乐谱填词，所以在字数、句数、平仄、用韵等方面，都要受到乐律的制约，故词又名“倚声”，即按声律填词。乐谱多种多样，词的形式也就跟着千变万化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词调。

词，作为一种诗体的专称是比较后起的。在唐五代时，这种新的抒情诗体原来叫做“曲子词”，后来又有“诗余”、“乐府”、“长短句”等别称。

一、曲子词。

曲子词简称“词”，也就是“歌词”。这个名称最清楚、最准

确地表明了词体的性质，表明了词与曲的关系。“曲”是指音乐的部分，“词”是指文辞的部分，这二者原是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，是不可分离的。

清代刘熙载《艺概》卷四云：“词即曲之词，曲即词之曲。”

清代宋翔凤《乐府余论》说：“以文写之则为词，以声度之则为曲。”

这些话对词、曲两者之间的关系作了最明确的解释，所以说“曲子词”是词体最确切的全称。

唐五代及北宋很少有人把词单独称为“词”的，一般根据歌词的性质称之为“曲子词”、“曲子”、“曲”或“歌词”。例如：

晋相和凝，少时好为曲子词。……契丹入夷门，号为“曲子相公”。

（孙光宪：《北梦琐言》卷六）

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，吏部不放改官。三变不能堪，诣政府。晏公曰：“贤俊作曲子么？”

三变曰：“只如相公亦作曲子。”公曰：“殊虽作曲子，不曾道‘彩线慵拈伴伊坐’。”柳遂退。

（张舜民：《画墁录》）

东坡云：“世言柳耆卿曲俗，非也。如《八声甘州》云：‘霜风凄紧，关河冷落，残照当楼。’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。”

（赵令畤：《侯鲭录》卷七）

盖诗文分平侧，而歌词分五音……乃知别是一家，知之者少。

（李清照：《词论》）

唐末五代的文人词，也被称为“诗客曲子词”。例如：

今卫尉少卿字弘基……广会众宾，时延佳论。因集近来诗客曲子词五百首，分为十卷。

（欧阳炯：《花间集叙》）

在曲子词前面加上“诗客”二字，可能是为了区别于民间的曲子词，表示为文人的作品。

宋人为了区别古乐府，又把词称为“今曲子”。例如：

古乐府只是诗中间却添许多泛声。后来人怕失了那泛声，逐一声添个实字，遂成长短句。“今曲子”便是。

（朱熹：《朱子语类》卷一百四十）

盖隋以来，今之所谓“曲子”者渐兴，至唐稍盛，今则繁声淫奏，殆不可数。古歌变为古乐府，古乐府变为“今曲子”。其本一也。

（王灼：《碧溪漫志》卷一）

在词调中有不少带“子”字的调名，如《采桑子》、《南乡子》、《破阵子》、《更漏子》、《江城子》、《卜算子》、《女冠子》等，“子”就是曲子的简称。

二、诗余。

“诗余”之说始见于宋南渡初年王灼的《碧鸡漫志》卷二中：“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，溢而作词曲。”与王灼同时之林淳有词集名《定斋诗余》，其后又有廖行之的词集名《省斋诗余》。又据《蜀中诗话》所载：“唐人长短句，诗之余也，始于太白，太白以草堂名集。故谓之《草堂诗余》。”此书编定时间当在宋宁宗庆元年间，恰好廖行之也生活在这段时间里，可见这个名称的出现不会晚于南宋。宋元人把自己词集称“诗余”的还有吴则礼的《北湖诗余》、韩元吉的《南涧诗余》、王之望的《汉滨诗余》、张铉的《南湖诗余》、吴潜的《履斋诗余》、黄机的《竹斋诗余》、葛长庚的《玉蟾先生诗余》、吴存《乐庵诗余》等等。

把词称为“诗余”，有两种解释：

其一，当做“余波”、“剩义”。如宋代王应麟在《困学纪闻》中主张词是从古乐府发展而来的：“古乐府者，诗之旁行也；词曲者，古乐府之末造也。”近人王以懋也认为词是“三百篇”之余：

“非五、七言之余，‘三百篇’之余。”这种主张带有轻视词的看法。清毛先舒《填词名解》云：“填词不得名诗余，犹曲自名曲，不得名词余。又诗有近体，不得名古诗余，楚骚不得名经余也。……故填词本按实得名，名实恰合，何必名诗余哉。”清汪森《词综序》也说：“古诗之于乐府，近体之于词，分镳并骋，非有先后。谓诗降为词，以词为诗之余，殆非通论矣。”他们都是反对把词贬低为诗余的。

其二，作为“盈余”之余，以为词是由唐代近体诗——五、七言律、绝演变而来的，即五、七言律、绝为了入乐，加入“和声”、“泛声”、“散声”等，然后固定化变成长短句。持这种看法的有宋王灼的《碧鸡漫志》、朱熹的《朱子语类》、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，以及明杨慎的《丹铅录》、近人况周颐的《蕙风词话》和现代胡适的《中国词史大纲》等。其中以《蕙风词话》卷一说法最有代表性：“诗余之‘余’，作‘盈余’之‘余’解。唐人朝成一诗，夕付管弦，往往声希节促，则加入和声。凡和声皆以实字填之，遂成为词。词之情文节奏，并皆有余于诗，故曰‘诗余’。世俗之说，若以词为诗之剩义，则误解此‘余’字矣。”其实，这种说法并不完全符合词产生的过程和唐代歌诗的实际情况。词的产生和创作本来就是为了配合音乐，歌词必须配合乐曲，所以一开始就有长短句的采用，实际上是齐言与杂言两者同时并用。据现有的资料可以知道，隋唐之际，已出现长短句的词了。唐代歌词，固然有不少是用五、七言诗，但也有很多是用长短句的。文人词虽比五、七言诗晚出，但长短句在民间却已先行。所以说词是从五、七言律、绝演化而来，并不尽合实际情况。当然，如果完全否认唐代五、七言绝、律配乐付诸管弦，对词的形成和发展起过促进作用的事实，也是不客观的。所以对词的产生和演变，正确的观点应是多元论，而不是一元论。

三、乐府。

乐府本是西汉的音乐机关，汉文帝以夏侯宽为乐府令，汉武帝以